

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

我们的奋斗

□孔亚雷



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



《我的奋斗》六卷本

《我的奋斗》——这是个肮脏的书名。但现在,另一个欧洲人,来自挪威的小说家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让这个书名有了新的含义。出生于1968年的卡尔·奥韦,在2009年至2011年间以疯狂的速度出版了六卷本、厚达3500页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它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关于卡尔·奥韦·克瑙斯加德的一切。他的亲人、朋友、隐私。他的沉思、抱怨、绝望,他的烟瘾、食谱、阅读书目,他日复一日的做家务、带孩子、换尿布。总之,他的一切——毫无隐瞒,毫无矫饰,毫不畏惧。然而,奇特的是,这些几乎没有情节可言、不加节制的长篇流水账却产生了一种强劲的、犹如漩涡般的吸引力。“我被它彻底迷住了”,一位美国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留言说,“以致于我不得不严格限制每天的阅读页数”。它在挪威的销量高达50万册(相当于每10个人就有一本)。一个文学奇迹,又一个。跟所有文学奇迹一样,它击中了我们,击中了我们作为人——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生物性的——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焦虑。如果说卡尔·奥韦那庞大而松散的记录(但笔记却流畅而清澈)有一个中心,一个黑洞般吸取一切的凝聚点,那就是他的写作焦虑——他无法写作的焦虑。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写作,但每个人都会焦虑,或多或少。而从本质上说,所有焦虑都有一个同样的起源,那就是死,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那也许就是为什么整部书会以“死亡”开始:“对心脏来说,生命很简单,它能跳多久就跳多久。然后它就停了。迟早有一天,这种反复跳动会自行终止,血液开始流向身体的最低点,积成一个小血洼,从外部看便是渐渐发白的皮肤上一个黑色的软块,同时体温下降,肢体变硬,肠道清空。”在对死亡进行了一番冷静有力的长篇剖析之后,毫无过渡即及其自然地(甚至没有分段),文体从议论滑入叙述,滑入了一个8岁小男孩对父亲的童年回忆。卡尔·奥韦似乎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意识流,跟乔伊斯或伍尔

夫的意识流不同,他的意识流没有任何晦涩感,我们在他的意识中随波逐流(有时你几乎会忘记这是他写的,而不是想的),我们与他一起,自由而又自如地在各种元素间来回切换:现实与回忆、冷酷与温柔、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辨与新浪潮电影色彩鲜明的生动场景,直至来到小说第一卷——标题为《家中丧事》——的中心事件,也是整部书写作的触发点:他父亲的死。他父亲死于一栋堆满垃圾、散发出恶臭的房子里,死在无数空酒杯的环绕之中。他父亲的死,与小说的第一句话遥相呼应,似乎既是某种印证,又是某种反驳。是的,对心脏来说,生命也许很简单,但对心来说,生命却并不那么简单:它不仅是跳多久的问题,更是怎样跳的问题。40岁那年,他父亲选择了另一种“跳法”,他不顾一切地抛下妻子和两个儿子,开始了随心所欲、酗酒颓废的独居生活。同样在快40岁时,他哥哥突然决定离婚。而当他开始写《我的奋斗》——同样,不顾一切地——他39岁是一道分界线,是改变活法的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挣扎、最后一次奋斗(在挪威文和英文里,挣扎和奋斗是同一个词)。“很快我就40了”,他说,“到了40,离50也就不远了。到了50,离60也就不远了。到了60,离70也就不远了。然后就差不多了。”焦虑的起源是死亡,但焦虑的目的是生命,是察觉到生命的流逝与空阔,是对自己生命使用方式的质疑:我不是在浪费我的人生,我难道要一直这样下去,一直到死?就像俄罗斯诗人克瑞尔·马德威德夫(Kirill Medvedev)在一首诗中所写的:

■动态

若泽·萨拉马戈: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

1987年,翻译家范维信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评论家阿尔瓦洛·萨拉马戈说了一句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话:“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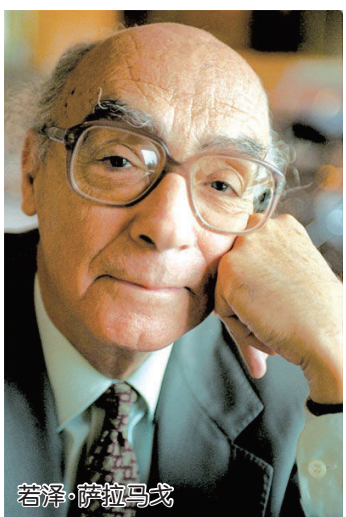
萨拉马戈可能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葡萄牙作家。出生于1922年的萨拉马戈于1947年出版首部小说,但并未引起人们关注,直到1982年《修道院纪事》出版,才成为享誉葡萄牙文坛的大家;而1995年出版《失明症漫记》后,他赢得了199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还是葡萄牙唯一的诺奖获奖作家。在他摘得诺奖之前,由范维信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已经获得我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今年3月,“新经典”与南海出版公司合作,再次推出萨拉马戈的代表作《失明症漫记》及其姊妹篇《复活症漫记》,这也是《失明症漫记》中文版第一次面世。在3月11日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作家范维信、止庵和任晓雯与读者分享了他们阅读萨拉马戈的感受。

他写作不是为了供读者消遣

《失明症漫记》仿佛一部寓言。小说里所有的人患上了失明症,除了医生的妻子。在极端处境下,萨拉马戈将人性的善与恶、人类的生存现状以及面临的困境展现得让人震撼。但是和《鼠疫》(1984)等作品不同,它把故事背景放置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孤岛或者封闭的城中以及“铁幕”之下,然而,正因其平常,因其与现实的贴切感,它所展示的图景和困境才更加可怕。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这部作品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我毫不退缩地写出一部如此冷酷无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是很好。我的小说不过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罢了。”

“他起始的那个点非常小。《失明症漫记》始于一个念头,假如失明可以传染……将是一个什么情况?换一个作家可能就是短篇小说了。”止庵说,他一直在思考《失明症漫记》和《复活症漫记》都没有多么复杂的情节,可是为什么写得这么有意思。“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特别奇怪,别的一个作家写一句话,他可以写10句,而且这10句都不是多余的。换句话说,可能写一句话的那个人没有写



若泽·萨拉马戈

够。而我们的作家开始的时候野心很大,但是后面却达不到了。”

在范维信看来,有的写作是从生活走向思想,有的写作是从思想走向文学,萨拉马戈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从思想走向文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它的构思并不难,让一个城市、一个村庄所有人失明,我们每个人都产生这样的想法,把这样的念头发挥一下,一个小说的框架就已经具备了。但是,你能否回到人的最初的状态,回到生活最原本的地方?这才是最难,也是萨拉马戈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从巨大的、荒诞的念头让人回到最初的原点,我们面对吃、面对穿、面对情感、面对一切丑恶和美好,一切都从头开始,从动物变成人,从人变成动物,相互交错。在这些细碎当达到相当深刻的高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恰恰我们写作的问题也就在这里,每个人走在路上都可以想到一个奇怪的想法,都可能变成一部好的寓言小说,但是你能往哪个方向走,能否达到别人达不到的高度,这是一个难点。”

阅读萨拉马戈也让范维信反思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能力、文学性不在于你逃避不逃避政治,而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量去面对政治和把握政治。小说题材都不分高低,关键在于最终你能把它写得有多高,写到什么境界。中国作家恰恰在这方面不成熟的共识,似乎对政治就不不是文学。”《失明症漫记》恰恰告诉我们,不在于你面对不面对政治,而是在于

你有没有能力面对,这是一个作家的能力。我们今天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在他看来,“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范维信在译后记中写道:“他的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

细节像钉子一样让人无法忘记

阎连科在15年前读过《失明症漫记》,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情节、细节都在脑海里。“译者是谁我没有记住,甚至作家的名字我也没有记住,但是这部书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在他看来,有些作家的作品,阅读之后的印象是漂浮不定的,但是永远伴随着你,比如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但是真正写作的时候,你发现他写作中的什么你都学不到。他给写作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巨大的,但又是让你抓不住的。另外一种作品是,作家的名字、关于作品的其他东西可能都记不住,但是小说永远记在脑海里,比如《失明症漫记》。它有那么丰沛的情感,故事却是简单单纯的,其中的细

节以及带给你的震撼却让你永生难忘。

萨拉马戈开始写作的时间并不晚,但是他长时间没有把主业放在写作上,代表作品都是在他晚年完成的,但正如上述所说,“我们看到《失明症漫记》的时候有一个感受特别奇怪,就是那种元气充沛淋漓尽致的感觉,这个状态有点像咱们说的‘有如神助’,好像脑子里有一束光,把所有角落都照亮了。”

只用逗号和句号的作家

在《失明症漫记》里,无论是平实的叙事还是饱满激情的笔调,无论是怪诞离奇的故事还是人物之间冷静的对话,萨拉马戈在行文里只用逗号和句号。他的作品冷峻到取消了角色名称,抹除了叙述与对话的界限甚至尽可能地剔除了标点,除了逗号和句号,其他常用标点符号一律没有。人物对话与小说叙事似乎无缝相连,宛如内心独白,对此,萨拉马戈本人说,读者应当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抓住节奏,因为他的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就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故事那样”。为了保持萨拉马戈小说原有的风格,又要让中国的读者能看懂,范维信“考虑再三,决定增加一个分号”。(刘秀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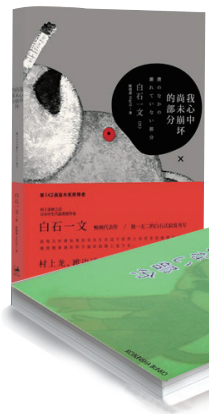


根据小说《失明症漫记》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瞭望台



白石一文



《我心中尚尚未崩坏的部分》中日文版

东京的忧郁

□行超

白石一文《我心中尚尚未崩坏的部分》

20年前,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出现曾让中国读者为之惊艳。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这本书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日本文学曾一度成为白领、小资津津乐道的话题,书中对爱情、对性、对生命、对人生的理解几乎颠覆了彼时中国读者的一切想象。

与村上春树在日本本土和海外的迅速走红相比,1958年出生的白石一文对中国读者来说,似乎还有些陌生。《我心中尚尚未崩坏的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是译介到中国大陆的首部白石一文的作品,小说故事并不复杂,东京某家出版社的编辑松原直人幼年时被父亲遗弃,母亲先后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对他亦缺乏关爱。成年后的直人收入颇丰,却常常有着异于常人的想法,他不仅疏远亲人、不相信爱情,甚至对生命和生活本身也充满怀疑。也许正是这样奇特的想法引发了小说中多位女性对直人的好感:家境富足、欲罢难缠的大西昭子,艰难地独自经营酒吧的单身母亲朋美,年轻貌美、善解人意的枝里子。不过,周旋在这几个女人之中的直人非但没有得到满足,反而自始至终都感到一种彻骨的孤独,与他的朋友小灰、雷太一样,直人对眼前的一切充满厌弃,找不到生活的动力和热情。在渴望与抗拒之间,直人以叛逆的姿态抵抗着来自外部的伤害。

当然,白石一文的野心绝不只是讲述一个充满纠葛的爱欲故事。小说中的松原直人是典型的现代都市人,表面上看,他在外形、学历、收入等方面都颇令人羡慕,但他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深刻的秘密和伤痕。直人与3位女性的交往明确体现了现代都市人的通病——对亲密关系的恐惧。直人相信自己大学德语老师曾说的:“女人的身体是宝物,身体之外的部分却令人厌恶,因此,为了那宝物得忍受其他厌恶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交往’”。小说中的枝里子性格温柔、外形姣好,是完美的交往对象,而当她提出希望带直人去见自己的父母时,直人却“心别想开玩笑了”,并以“我完全不相信家庭这种东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一方面享受着枝里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心中充满了安稳的感受,把一切交付予她”;另一方面又觉得跟她“是不同世界的人”,因此在相处中时常感到压力,甚至数次产生逃离这段关系的念头。相反,在与大西昭子的交往中,直人却轻松得多。对于富有而寂寞的大西夫人而言,直人不过是用来满足欲望的性伙伴;对于直人来说,与大西昭子的交往,确保了在持续支付母亲的高额医疗费用。这种关系简单而赤裸,因此反而让直人放下了防备,大西夫人也成了直人了解直人的身世和他母亲病危消息的人。小说中,亲密的关系让直人产生了逃离与疏远念头,而远离情感瓜葛的利益/性交易却让他可以敞开心扉,委以信任。这是松原直人身上明显的人格缺陷,也是现代都市人的通病。

贫穷而缺乏关爱的童年是直人一生难以拂去的阴影,成年后的他虽然独自承担了母亲的高额医疗费,却始终不愿回家探望,以此避免与母亲和妹妹的相聚。然而,对于单身母亲朋美的儿子拓也,直人却有着近乎父爱式的关怀和照顾,他不仅常常探望拓也,带拓也去郊游,更在朋美手足无措时承担起救治拓也的任务,这一切,都超越了拓也真正的父亲朴功一。更为吊诡的是,直人做这一切完全不是为了接近拓也的母亲朋美,他“谈起朋美的事情时,偶尔会有那种与我何干的冷漠表情,可是一谈起拓也,老是一脸认真”。也许是拓也缺失的父爱和残缺的童年让直人看到了自己多年前的样子,外表冷漠、玩世不恭的他只有在拓也面前才真正成为有一个血有肉、爱憎分明的人,也只有在与拓也的相处中,他才完整地暴露了自己“心中尚尚未崩坏的部分”。

早在两百多年前,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就以他天才的智慧创造了一种新的侦探小说,在他的侦探小说中,主角不仅持续寻找谜底,更是一个局外人的双眼不断地冷眼观察着这个世界。通过侦探的双眼,爱伦·坡发现了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唠叨病、疑心病、孤独病。现代人的精神疾病来自恐惧和不安,这种恐惧来自对陌生世界的好奇、对自我存在的怀疑和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在白石一文的《我心中尚尚未崩坏的部分》中,不仅是松原直人、大西昭子、朋美、枝里子、雷太等都面对着相似的精神困境。小说最后,雷太杀死了时任首相田川敬一郎,在供词中,雷太说:“我没想过要改变这个社会,也不觉得这个人(宇田川首相)搞懂了日本什么,因为我对政治没兴趣,也不常看报纸、新闻,但是,总觉得首相好像很伟大的样子,不过,如果跟我一起死掉的话,世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吧,我只是想告诉各位如此的道理吧……总之,赶快判我死刑之类的吧!因为要我自己死,我可是超级不拿手的。”

小说中作者不断探究存在的意义与死亡的可能性,主角直人多次向自己发问:“我对于如此的生活压根儿没有感到愉悦,但我又为什么继续活着呢?”“为什么自己不自杀呢?”“你是真的不想死吗?如果是的话,理由是什么呢?”……而小灰也与他面临着相同的困扰,直人与小灰5年后再次相遇时曾向她提问:“你啊,是想死吗?”小灰如实回答:“我不知道。”对于小说中的直人来说,对于作者白石一文来说,死亡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呼吸停止、心脏停跳;他们更关注生的必要性与死的可能性。对此,直人有一套自己的哲理,他认为自己对生厌恶、对死难的原因是:“如同自己没有权利和资格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只不过没有剥夺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资格而已”,“既没有恣意于自己生命的权利,更不会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人并非生存,而仅仅是被迫生存”。

从这个角度看,雷太的行动几乎成为这一理论的确证。当雷太下定决心刺杀首相时,他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死亡对他来说已经是劫难逃。刺杀行动完成之后,雷太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他时刻都向往着死亡,希望别人尽快动手了结自己。然而,他既然有如此大的勇气面对死亡,却没有勇气自己动手结束这难以预期的等待呢?对生存的漠视构成了他们面对死亡时的虚无主义,然而对于死亡,人类总是无知的。死亡的瞬间、死后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陌生的,这也就是人类不断地思考生与死的关系,不断地向死亡发问的原因。正如直人所想,人们缺乏的是自我了结的勇气和权力,因此,借由法律之手了结自己的生命,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吧?小说中的直人、雷太、小灰等都对于死亡有着超常的思考,这是一群同情相怜,却又无法相互取暖的“向死而生”的人。

《我心中尚尚未崩坏的部分》是典型的都市小说,书中所描摹的人的处境与心理、精神问题都是典型的都市人的写照。现代都市的发展逐渐解决了物质贫乏的问题,生活在都市中的人逐渐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扰,转而思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探讨的从来不是生存,而是存在,也就是说,他们探寻的是精神层面,或者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正如书中所说,“人的存在,如果拿竹筛彻底过滤掉所有终会消逝的东西,像是青春、美貌、爱情、情感、富贵、地位、金钱、时间等等,所剩的骨子里就只有人类共通的老、病、死”。在死亡面前,无论你生活在如何优越的环境中,无论你身边有多少人的环绕,你从来都是,也只能永远是孤军奋战。对于都市人来说,生与死一样,需要莫大的勇气。生与死的困扰,一直是都市人心中最难摆脱的忧郁。